

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 财政问题研究

寇琳琳 寇铁军 · 著



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 财政问题研究

寇琳琳 寇铁军 ● 著

© 寇琳琳 寇铁军 201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财政问题研究 / 寇琳琳, 寇铁军著. —大连 :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654-1393-3

I. 我… II. ①寇… ②寇… III. 财政-研究-中国 IV. F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98742 号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

(大连市黑石礁尖山街 217 号 邮政编码 116025)

教学支持: (0411) 84710309

营 销 部: (0411) 84710711

总 编 室: (0411) 84710523

网 址: <http://www.dufep.cn>

读者信箱: dufep@dufe.edu.cn

大连天骄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发行

幅面尺寸: 185mm×260mm 字数: 531 千字 印张: 24 1/2 插页: 1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彬 周慧 宋雪凌 魏巍 责任校对: 刘洋 赵楠
封面设计: 冀贵收 版式设计: 钟福建

ISBN 978-7-5654-1393-3

定价: 48.00 元

作者简介

寇琳琳，女，1981年3月生，辽宁大连人。2003年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计算机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大连海事大学计算机专业，获工学硕士学位，后到东北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任教，先后任助教、讲师，并于2013年获管理学博士学位。曾在《建筑经济》、《财政监督》、《地方财政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20篇；公开出版专著2部；主持并完成省级课题2项，目前正在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及其他科研课题多项。

寇铁军，男，1954年3月生，辽宁台安人。1978年毕业于辽宁财经学院财政专业并留校任教至今，其间1982年至1985年在辽宁财经学院财政专业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1992年至199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专业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1996年夏至1997年春作为国家公派高级访问学者在加拿大皇后大学政府间关系研究所研修。现为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财政学）带头人之一；学校党委委员、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财政学会理事、中国农村财政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高等院校财政学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曾先后任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系副主任（1993年1月）、财政税务学院党总支书记兼副院长（1996年1月）、财政税务学院院长兼党总支书记（1999年4月至2003年12月）、财政税务学院院长（2003年12月至2013年1月），国家财政部教材编审委员会成员、辽宁省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辽宁省社会科学评奖委员会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通讯评审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通讯评审专家、国家教育部优秀博士论文通讯评审专家、国家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评审专家。

曾在《财贸经济》、《财政研究》、《税务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投资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等学术刊物公开发表论文逾百篇。曾出版专著《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中国财政若干热点问题研究》。曾出版教材《财政学教程》（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财政管理》、《财政与金融》等。曾主持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及国家教育部项目1项。现正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科技部项目各1项。

曾在多次论文、专著评奖中获奖。曾被评为大连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大连市劳动模范、辽宁省国家级重点学科建设先进个人。

代序言

学者师 师者范

——访著名财政学者、东北财经大学寇铁军教授

寇铁军：著名财政学者，曾担任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全国农村财政研究会常务理事，辽宁省财政学会常务理事，《地方财政研究》副主编。

味苦：三年知青

“当知青那段时间，‘苦’是很常见的事情。但是，三年多的知青生活对我世界观的形成及以后人生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在当知青的三年多时间里，寇铁军把苦当成人生的一种历练，从艰苦走向优秀，三年知青生活，累积了数十年的人生财富。

记者：听说您下乡当过知青，请您讲讲早期的个人经历。

寇教授：1971年，我中学毕业开始下乡，在乡下待了三年零九个月。当知青那段时间很辛苦，每天天不亮就要开始干活，天黑了才收工。如此循环往复，很多事情都难以用语言来表达，有不少知青讲过这段经历。

那段时期，“苦”是很常见的事情。我印象很深的是，每年一到春天，白菜萝卜都吃光了，吃饭就成问题。一个知青点有一百多人，到吃饭时每一张桌子上摆着一大碗咸盐粒子，就用咸盐粒子和着东北玉米面大饼子吃，或者一碗高粱米饭，没有菜就夹着咸盐粒子吃，当时就是这么过来的。

我当知青时应该算是表现比较优秀，担任了青年点点长、团支部书记、大队团总支书记、民兵连长等职务，还兼任生产队青年队长。并且在1975年5月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至今党龄38年，算是一名老党员。1975年，经过青年点、生产大队综合评议，我被选送至辽宁财经学院上大学，俗称工农兵学员，后官方改称为大学普通班，现任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王岐山等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我的大学时期是从1975年9月至1978年7月。当时，毛主席说要缩短学制，要革命，于是将大学从四年变成三年。三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留校任教，后来一直在学校工作，这期间攻读硕士和博士。我的基本经历就是这样，比较简单。

记者：作为知青点点长，您在管理知青团队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寇教授：由于知青点的人比较多，管理起来相当不容易。首要解决的就

是吃的问题。当时吃得比较差，我的主要任务是管理好伙食，把大家的伙食弄好点。伙食好了，一百多人才能生活好，才不会去偷、抢百姓的东西，避免与老百姓发生不必要的冲突。

另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是处理好知青与农民之间的关系。知识青年下乡到农村没有太多收入，有的人去祸害农民的家禽，对老百姓生活影响十分大。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有一年夏天我们种的菜被农民养的家禽给吃了。当时我们做了一件特别好笑的事情。为了防止家禽再次偷吃菜，我们把这些鸡、鸭、鹅全部抓起来，用树枝将它们的嘴支起来，然后放到青年点的房子上，房子的屋顶是平的，这样它们就飞不下来。这些事情我们都经历过，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

其实，知青中有一部分人对农村的发展是有贡献，比如在文化传承等方面。但是，在当时的农村环境下，相当一部分人对农村治安产生了负面影响。作为知青点点长，很大程度上是处理好下乡知青与当地老百姓之间的关系，这样才有立足之地，不然坐地户的意见对点长和知青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记者：您的父母都是教师，他们对您的学习和生活有哪些深刻影响？

寇教授：他们二位都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开始搞教学。“文革”期间提出的“读书无用论”在我们家体现得不是很明显，父母都支持我学习，他们认为学了总比不学习强。

特别是在1975年被选送过程中，我父亲极力主张我上大学。当时我在青年点当点长，也有一定实力，可以招工、提干。走之前公社领导与我谈过话，说如果愿意到公社工作，有两个职位可以提供给我：一个是当公社团委书记；另一个是畜牧助理。当时，毛主席提出要大力发展养猪业。公社管理各方面都有一个助理，也就相应设置了畜牧助理。当时我想去哪个岗位都可以，但是我父亲坚持让我上大学。现在想想父亲对我的影响很大。

我父亲是1951年从东北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的，被分配在辽宁省台安县工作，所以我的出生地就是写的台安。实际上，我出生没几个月他就调走了，然后长期在一所重点高中当校长。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每年高考前那段时间，从头一年寒假到第二年上半年，他基本不在家里住，连床都在办公室。那时学校要求重点高中校长必须住校。我们家住在学校的大院子里，离他的办公室很近，差不多一百多米，即便这样他也基本不回家，在校主抓升学率。每天他和我母亲都是早上走晚上很晚才回来。当时家庭条件还不错，家里雇了保姆专门照顾我，保姆从早上一直带到晚上八九点他们下班回来才走，现在基本很少见到这样的老师了。

记者：现在回想起来，当知青的这段经历对您的人生成长有什么影响？

寇教授：现在看来，下乡当知青的三年多时间对我世界观的形成及以后人生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我的很多感悟和经验都是在那个时期积累起来的。比如现在搞学术研究所必备的吃苦耐劳精神也是在农村工作时期打下的基础，现在即使再苦也没有那时候苦。以前冬天东北炕上很热，但屋里很冷，晚上睡觉得戴皮帽子和口罩，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基本不用这些东西了。在农村工作的历练，养成了我能吃苦、不怕累的品质，塑造了我一生的性格。

偶遇财政学

“与财政学结缘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就这样，一个身体不太合格的人进了辽宁财经学院攻读财政学。”谈话中，寇铁军两次提到这两句话。学习财政学或许并不是自己的初衷，这种“被安排”的命运，让他与财政学结缘近四十年。

记者：从您的经历来看，即使在逆境中也表现得很优秀。被选送上大学学习，您是如何与财政学结缘的？

寇教授：学习财政学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们上大学都是由组织统一分配的。刚开始组织准备选送我到理工科学校学习，但是由于我体检不合格（血压过高），就改派到文科学校学习。首先安排我到辽宁大学中文系读书，但是那里已经安排满了，于是就将我调到辽宁财经学院财政系学习。就这样，一个身体不太合格的人进了辽宁财经学院财政系读书。

其实，当时我并不知道财政学究竟是学什么的。有人告诉我说可能是与会计相关，需要打算盘。我当时很想上工科类学校，但是由于身体原因上不了，心想打算盘就打算盘吧！刚开始到辽宁财经学院时，财政学专业相关书籍很少。我记得看过一本上世纪60年代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财政学教材，从这本书里我了解了一些关于财政学的基础知识。

现在看来，与财政学结缘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由于身体不合格被“甩”到这个学科，并且刚开始根本不知道它是研究什么的。

记者：如果说大学学习财政学是“被选择”的，那么，随后攻读的财政学专业硕士、博士，是出于对专业的兴趣吗？

寇教授：起初，我对财政学仅仅有一些感性认识。尤其是了解到196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就是在辽宁财经学院召开的，那次会议的讨论成果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整理出版了一个上下册的讨论集，第一届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在东北召开，而且就是在辽宁财经学院的一个教室里，这让我感到很意外，由此，也对财政学多了几分学习兴趣。

读书期间，我身上背负的成分压力挺大的。我们是工农兵学员，也叫作工农兵大学生，要担负上、管、改的任务，即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所以，我们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学习，学习的课程很少，数学不开，外语也不开，当时是在这种情况下读完大学的。可以说，我们在学校期间的学习几乎就是一张白纸，大学阶段没有学习到很多知识。直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才开始正规上课学习。可以说，是社会改变了人的命运，如果还是像以前那样，我们根本不会有专业学习的概念。

好在家庭对我的影响比较大，我的父母都是学校教师。我在学校学习期间除了学习专业课之外，还看了一些中外历史书来充实自己。留校任教后，我通过旁听、自学把数学和英语这两门课程给补起来了。因为只有补上这两门课才能考硕士，这两门不过关，是肯定考不上硕士的。我是1982年参加的全国硕士考试，在本校刘明远老师门下完成了硕士研究生学业；199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陈共老师门下完成了博士研究生学业。

记者：您大学毕业之后就留校任教，当时为什么选择留校？

寇教授：前面提到过学习财政学挺偶然，后面留校任教也是一次偶然的机。留校并不是我自己选择的，也是由学校安排的。毕业时，我们班有两个名额可以去财政部工作，我当时比较想去财政部。1978年6月，时任东北财经大学财政金融系主任林继肯教授（获得“2012年度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找我谈话，他想让我留校任教，但是与我谈话中并没有明确说明这件事。于是，他找我们辅导员给我做思想工作。辅导员听说我不愿意留校，就找我谈话，说如果我不愿意留校就将我分配到偏远的地方工作。就这样，我被安排留校，从1978年一直到现在，已经35年了。

“特色才有生命力”

“一个专业，一个学科，只有有特色才有生命力，没有特色就没有多少生命力。”他笑称东北财经大学是“地方军”，非211、非985、非教育部直属院校。2007年，东北财经大学财政学科成功入选国家重点学科。他说，这是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当院长期间最大的遗憾是学科建设缺乏特色，并叮嘱下一任院长做出特色。

记者：从1993年起，您开始担任财政系副主任，后又较长时期担任财政税务学院院长，为学科建设做了大量工作，主要从哪些方面进行管理？

寇教授：我是从1993年1月开始走上行政管理岗位的，起初担任财政系副主任。1995年底，经财政部批准，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系与税务系合并，成立了财政税务学院，我担任党总支书记、副院长，后于1999年4月到2013年1月任院长。

这期间我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抓学科建设。因为学科建设是龙头。这些年来，在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之下，东北财经大学财政学科建设取得了较大发展。1996年和2002年，财政部、辽宁省确定我校财税学科为财政部、辽宁省重点学科；2007年，财政学专业被教育部确定为国家重点学科；2008、2009年，财政学专业和税务专业先后被教育部评为国家级特色专业。

这些荣誉得来不易。因为非211、非985、非教育部直属院校很少有国家重点学科，目前拥有财政学国家二级重点学科的学校全国仅有三所：上海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东北财经大学。而在这三所学校里面，上海财经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都是211和教育部直属院校，只有东北财经大学是地方院校，应该说批下来很不容易。但是，听到消息后兴奋劲没保持多久，随之而来的是压力。

与前面的学校相比，我们还有很大差距，而且差距可能会越来越大。这其中有很多原因，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人才。所谓“人往高处走”，在人才引进方面，很多高级人才会首选211、部属重点高校，其次才是地方院校，我称为“地方军”、“游击队”，而别人是“国军”。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资金，资金也是往高处流。211、985、教育部直属院校的学科建设资金尤其是科研资金较为充沛，由于科研需要做很多前期准备工作，而地方院校基本没有相应的前期科研经费，只有一般办公经费，没有项目大投入，所以在科研方面也是有差距的。因此，对于我们而言，能评上国家重点学科很高兴，但是只高兴了一会儿，更多的是一种压力。“前有标兵后有追兵”，前面的越跑越快，后面的追兵穷追不舍。

另外，我当院长期间也有一些遗憾，虽然从学科建设上抓住了龙头，强调科研要出精品，要占领制高点，但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在我主持工作期间学科特色不足。像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都有自己的学科特色，但是我们在这方面有所欠缺。因此，我在交接工作时也与下一任院长交代了，要突出我们的特色。一个专业，一个学科，只有有特色才有生命力，没有特色就没有多少生命力。因为大家都在建设这个学科，所以要在某个方面表现突出，找到自己的强项。因此，我觉得后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记者：您刚提到，得知财政学科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时压力重于喜悦，是如何将压力转化为动力推进学科建设的？

寇教授：首先，向国内排名靠前的学校学习，学习他们办学的长处；其次，学习国外的一些教学理念，争取一些国内外著名高校的老师短期或长期地来校任教。应该说，近年来我们在向国外学习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

我们实行学校出钱派出,鼓励老师“走出去”学习进修。但是,目前从国外引入的人才还没有。由于财政学科是一门特殊学科,它与政府联系较为紧密,而与市场的联系并没有那么紧密,因此,国外专门研究这个学科的人才比较少。目前国内高校中引入外国学者任教的也比较少。

学科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不是一年半载、两三年就能做出成效来。我在主持工作期间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前面说的抓学科建设,二是培养人文氛围。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创造和谐的环境。通过开展一些活动,如工会、各教学部门举办的活动,为学院人才发展创造和谐的环境;第二,培养“向上”的意识,特别是在培养科研精品意识方面,通过实施激励机制鼓励团队向上。一个团队不仅要有和谐的氛围,还得有向上的动力,只有将“和谐”与“向上”结合起来,学院才能获得整体发展。

记者:在1996—1997年期间,您出国去加拿大女王大学访问,这段出国经历对您开展研究有哪些影响?

寇教授:我是以教育部高级访问学者这个身份去的。当时通过了全国考试,在西安外国语学院出国留学班考的。去加拿大女王大学学习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1994年,东北财经大学承办了一个联合国开发署举办的国际会议,我在会上结识了几个专家。与他们谈到出国学习的事情,说国家已经批准我去加拿大学习,不知道选哪所学校。他们为我推荐了几所,有多伦多大学、麦吉尔大学,还有一些别的学校,但最后我选了加拿大女王大学。因为我有一个学生在那所学校念博士,考虑到各方面可能好照顾一些。正好女王大学政策研究院有一个政府间关系研究所,而我的博士毕业论文就是研究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因此,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书和资料。

其实,作为访问学者在国外并没有多大压力,主要是借机会自己多学习一点东西。我分别听了本科、硕士、博士的课程。在那里待了大半年时间,作为一般教授去国外学习,我要自己去商店买大米、买蔬菜,自己做饭,不像国内。这次出国学习对我的思想意识有较大改变。以前关于西方的看法与自己在国外亲眼看到的不一样,有些出入,其实,他们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这个观念我现在都一直坚持。

现在有些人包括有些学者认为,互联网资源很丰富,很多东西在网上可以查到,因此可以不出国了。但是我不这么认为,出去与不出去是完全不同的。网上看到的東西可以使你了解一些创新思维和学术动态等,但是不会改变你的思想意识,包括很多观念都改变不了。总之,出国对我的思想意识影响比较大。

记者：您主持了多项科研课题，先后有专著、论文获中国财政学会、财政部表彰。以您的研究经验，对从事学术研究者有哪些建议？

寇教授：我的建议都是比较基础的：第一，要打好基本理论功底。第二，要学习把握前人的研究成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问题才能有前瞻性。第三，要运用好工具书，包括辞典、统计年鉴、财政年鉴等等。现在无论写什么论文，都要求有论据作支撑。论据除了引用经典作家的理论以外，主要来源就是工具书、辞典和统计数字。所以，我经常对我的学生说：“你们一定要重视工具书和辞典。因为一个词从小处说只是一个小的概念，但它放大了就是一个大的理论问题。”我带学生时比较注重引导他们多看工具书，多研究数字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我让我的博士生看《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在当时那个年代，每个词条都是由著名的经济学者翻译出来的，一个词条就有一万多字，有时候比一篇论文还长。这部辞典有四大卷，学习经济相关专业的人一定要读。第四，要立足中国实际。在中国搞学术研究，如果不立足国情实际，在改革进程中不会有太大出路。要想在中国财政理论和财政实践中有所贡献，就必须结合国家实际，将所学和所用联系起来，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

为师：爱生如子

“年轻人别自卑，要奋斗。你战胜了自己，超越了自己，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是他对自己的人生经验总结，也是给年轻学子的谆谆教导。

记者：从学生到老师，自己当学生和自己教学生，这两个身份转变过程中，什么事情和人对您影响比较大？

寇教授：对于老师的认识，有两个人对我的影响比较深刻。其中一位是我的父亲。他的有些观点很务实，当校长时主要抓升学率，尽管当时有很多人反对，他坚持说：“我作为一个重点高中校长，不抓升学率抓什么，难道学生们不考重点大学考普通大学？”为此，“文革”期间他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特别是他对待学生非常好，爱生如子。“文革”期间，有些学生为躲避武斗，偷摸逃跑到我们家来敲门避难。因为我们家在学校，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在这样危险的时刻我父亲收留了他们。我记得那天晚上到我们家来有好几个学生，被人追打得没处跑，在我们家住了一宿。这些事情对我的影响很大。

而谈到教书育人，对我深受启发和感动的是我大学期间的启蒙老师姜维壮教授，他现在已经九十岁高龄了。在我读书期间，他为我们讲授财政学课程。1976年，全国出现财政赤字，要求财政学专业学生都要分赴各地去查账。他带领我们一部分学生去辽宁营口查账，那年他已经54岁了，在国内

也很有名气。我记得我们住宿是在营口饭店，本来他是单独一人一间房，但是他坚持与我们3个学生一起住。每天晚上只要有时间他就埋头写教案。由于酒店里没有写字台，他把凳子放倒坐在凳腿上，将床当作桌子趴着写教案。他的这种认真负责的教学态度和逆境中坚强不屈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了治学、学术成果，姜老师在为人处事方面更是有口皆碑，在大学期间能遇到这样一位财政学启蒙教师使我深感荣幸。

记者：执教35年，您带了许多本科、硕士和博士生，对自己带的学生有哪些要求？

寇教授：我对待学生比较宽容，没有太多苛刻的要求，只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环境下，会对学生提出一些具体的要求。整体来说，我认为，老师与学生应该互相学习，互相尊重，才能教学相长。

目前，我主要是带博士生和硕士生，硕士生带一点，主要以博士生为主。现在学校对博士要求越来越严格，而且管理也越来越规范。我个人对他们的要求是：首先要严格遵守学术道德规范。现在大家都比较重视这个问题，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可能涉及学术道德规范问题。过去我们很少讲这个问题，但现在由于版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的逐渐规范，社会上出现了很多学术造假、论文抄袭等问题。我要求学生首先要从思想上重视起来，在写东西的时候注意尽量回避简单重复劳动。

在学习方面，我推荐学生以看书讨论的方式进行学习。博士生至少要读几本经典著作，比如：《国富论》，它是市场经济刚开始时流行的古典经济学著作；再读读凯恩斯的《通论》，我经常跟他们说，凯恩斯主义就是官方经济学，现代西方国家不论谁执政，最后贯彻到根本上还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即政府经济学，突出政府的干预职能，突出需求。凯恩斯的突出贡献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前人研究侧重供给，他的研究侧重需求；二是别人研究侧重微观，他的研究侧重宏观；三是别人研究侧重市场，他的研究侧重政府。他对政府经济学有突出贡献，而且这些突出贡献深刻地影响了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的资本主义国家。我认为是这样的，所以我让他们读这些。另外，我还让他们读一些公共部门经济学的著作，如斯蒂格利茨、鲍德威的著作等。我所带的学生至少要读一些书，并认真写读书笔记，读完了大家在一起交流，这样思想才能互相碰撞，才能升华，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记者：您提到“师生之间要互相学习，互相尊重，才能教学相长”。在与学生相处过程中，您有哪些收获与体会？

寇教授：我体会比较深的是最近几年来学校组织教师与贫困学生结对

子，举办这种“一对一”的帮扶活动我觉得非常重要。作为指导老师，我们要主动找学生谈话，了解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上遇到的困难。我认为，师生之间只有相互尊重，才能更好地教书育人。

与贫困学生结对子是学校开展的一项活动，要求处级干部与本校贫困大学生结对子。像我们年龄越来越大，与学生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少。学校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这样一种方式，便于与学生沟通交流。此外，学校还实行了本科导师制。以前硕士、博士都有导师，现在本科生在大三、大四也设立了导师，我每年得带5个左右的本科生，指导他们学习、生活、选课等各个方面，使教师不要脱离年轻学生。我认为，老师一旦脱离学生，说话、做事、想问题都感觉乏力，通过与学生接触，能使老师更加年轻焕发，也增进了师生之间的感情。

记者：以您的个人经历和多年来的教学经验，有什么感悟与年轻人分享？

寇教授：我的经验是年轻人别自卑，要奋斗，这里提到的“奋斗”主要是与自己比较。毛主席曾说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你战胜了自己，超越了自己，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年轻人不要因为出身背景等原因而自卑，这些是不能选择的，要正确看待。我的自卑源于当时上大学不是通过高考，而是被选送的。当时有很多人带有偏见地认为选送生都是政治上的产物。现在想想在那种社会背景下，每个人都或多或少背负着一定的政治上的身份、政治上的行动和行为，关键是自己如何看待它。

现在的大学生有很多来自城里，也有一部分来自农村。来自农村的学生就很可能产生一定的自卑情绪。与我结对子的那些贫困大学生基本都是来自农村，我经常告诫他们不要自卑，出身不能由自己选择，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奋斗，通过奋斗来改变自己。改变命运虽然有一定的外部因素影响，但更多的是自身，要通过自身奋斗来改变命运。

记者：从院长职务退下来以后，您的工作和生活重心有哪些变化？

寇教授：工作方面，我现在还主持有两项课题：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课题，还有一个国家科技部的课题。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将这两个课题尽快完成，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课题。

平时闲暇之余，我喜欢看一些闲书，有两本杂志我比较喜欢看。一本是《读者》，比较贴近中国实际，我认为比较雅。另一本是《读书》，《读书》在学者里面似乎是更为高雅的刊物。《读者》的内容面很广，涉及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读书》更侧重各领域的热点问题和最新动态的认识。我每天睡觉之前喜欢看看，换换脑子。

记者手记：

采访之初，寇铁军教授多次推辞，强调并不是什么“大家”，更谈不上经济学家；采访末了，他又反复叮嘱：“如果非要冠名就写‘学者’，其他的都不用写。”“大家”栏目访谈以来，令我感悟最深的不仅仅是这些“大家”的学术著作和突出贡献，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对待学术的虔诚态度和谦和心态，我将这种学术精神奉若至宝。

目 录

【1】 略谈我的财政观	1
【2】 市场经济与财政宏观调控	6
【3】 关于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	10
【4】 论财政转移支付的实现方式	20
【5】 集权与分权的财政思考	24
【6】 税收划分：理论与实践	29
【7】 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33
【8】 关于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定性分析	40
【9】 振兴国家财政的基本思考	44
【10】 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财政政策取向	48
【11】 关于我国财政政策取向的基本分析	53
【12】 社会保障的产品属性探析	57
【13】 灰色系统理论在税收预测中的应用研究	62
【14】 关于强化财政监管的若干思考	67
【15】 关于增值税收入评价与预测方法的探讨	72
【16】 我国福利财政早熟性分析与对策	77
【17】 财政支出规模、结构与社会公平关系的研究	83
【18】 完善我国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的对策	90
【19】 集权与分权的程度对财政管理的影响	95
【2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实行国库集中支付相关问题研究	99
【21】 完善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若干思考	105
【22】 论调节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财政政策取向	111
【23】 论政府公共支出的公平取向问题	116
【24】 构建“以人为本，统筹发展”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122
【25】 政府间事权财权划分的法律安排 ——英、美、日、德的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127
【26】 我国预算监督机制改革问题研究	137
【27】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研究	146
【28】 我国政府间事权与支出划分	154
【29】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外部性分析	157
【30】 关于我国科技税收政策的思考	163

【31】 我国财政科技支出实证分析与政策选择	170
【32】 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基于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政府支出结构的比较分析	178
【33】 政府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 ——1993—2005 年间我国省级层面的分解分析	184
【34】 现行税制对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调控效应测度与分析	191
【35】 我国政府间事权财权划分的法治化选择	197
【36】 经济学理性主义与财政学基础理论的发展	205
【37】 公平、效率与制度安排	212
【38】 科学发展观视角下对财政监督的再认识 ——服务型财政监督	216
【39】 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财政关系变迁的博弈分析	222
【40】 城市居民收入地区差距的变动分析 ——以辽宁省为例	231
【41】 科学发展观的财政视角分析	237
【42】 统筹我国城乡发展的财政政策思考	241
【43】 我国“大一统”传统文化对政府间财力与事权匹配 问题的影响	247
【44】 促进辽宁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思考	257
【45】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财税政策作用探析	274
【46】 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研究	281
【47】 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探析	290
【48】 完善我国政府间财力与事权匹配的法律体系构建探讨	294
【49】 我国政府间国有资产管理管理职责划分的思考	303
【50】 制度建设与财政支持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可持续发展研究	309
【51】 支持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	315
【52】 我国财政支出监督法律问题研究	318
【53】 我国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实践挑战及推进建议	324
【54】 我国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体制性障碍及破解	338
【55】 我国财政支持义务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分析	345
【56】 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均等化效应测度与评价 ——基于横向财力失衡的多维视角分析	348
【57】 当前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成效、问题及对策	355

【58】 推进城市化进程的财政思考 ——以辽宁省大连市为例	360
【59】 健全分配制度 促进公平分配	366
【60】 建立政府全口径预算与完善政府复式预算体系的思考	369
后 记	373